

# 跨文化交际的新视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公民做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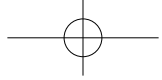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摘要：**21世纪的跨文化交际教育应实现从以培养实用性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向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公民教育的转变。为实现此目标，跨文化交际教育必须在目标、视域、路径以及研究范式等方面实现历史性的超越。本文在对跨文化交际之历史使命回顾与展望21世纪未来发展的基础上，论述21世纪的跨文化交际教育应以人类的全部历史和整个宇宙论为背景，以海纳百川的儒家“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一体之仁”的人类宇宙论为视界，以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公民教育为目标，以“利他”和“利己利人”之全球交际/对话伦理所确保和导引的跨文化交际，尤其是其理想形式平等对话为路径，实现育人载道的教育目标。为确保这些超越，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在继承传统的注重文化差异的社会—心理的客位研究范式的同时，尤其注重求索文化共同基础以及通过共同编译码从第三视角共同创建新的共识的主位研究范式。本文主张采用以自我反思为核心的批判—思辨范式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教育；人类宇宙论；命运共同体

## 1. 跨文化交际之历史使命：回顾与展望

跨文化交际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同文化交际和对话的历史。有人类就有文化，有文化，就有交际，“文化即交际，交际即文化”（Hall 1990: 90）。交际和对话预设着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交际和对话存在的必要。各种文化都具有互动性、交际性和对话性，不同文化的人们通过交际和对话相互汲取、互惠互利、相互交融、相互完善、共同发展、共创未来。跨文化交际，尤其是跨文化对话是人类文明的里程碑。罗素在其《中西方文化比较》一文中指出，历史已多次证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又何尝不是与不同文化相互对话、学习和交融的结晶？“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而印度佛教又在中国文化中得到发扬光大”（汤一介 2007：98）。儒道释互为镜鉴，共生共存，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中国文化是自身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与不同的他者互动和对话、不断重建自我和界定自身的过程。在人类不同文化的互动的长河中，常常发生对立、冲突乃至各种战争，但是“对人类具有强大威胁的对抗和冲突总是暂短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汲收和交融则是主导的”（汤一介 2007：98）。

跨文化交流从古至今促进了人类文化的进步、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也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但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和教学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跨文化交际研究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冷战结束后的八九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由于传播和交通技术发展，不同文化的人们在文化、教育、科技、经济、贸易等方面交往日益频繁，人们广泛认识到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跨文化交际学应运而生。

我国外语界的教师顺应这一潮流，首先引进和发展了跨文化交际这门学科。自其在我国问津以来的近四十余年中，本学科研究和教学与时俱进，逐渐走向成熟。尤其在中国文化开始复兴的21世纪，我们充满了文化自信，在向西方学习、借鉴、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开始创建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理论体系。其成果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为人类友好相处、建设和谐全球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21世纪全球化的今天，发达的电子传播技术之效应——“媒介即信息”（McLuhan 1964：9）——已成为现实。被比喻为人类身体延伸的电子中枢神经系统——国际互联网——瞬间跨越时空、伸延到整个星球，人类同住地球村已成为现实。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地球村”仍然存在着“我群”和“他群”，离理想的合而不同的“一群”还相差甚远。时空紧缩不仅为人类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不确定性，人类正面临从未经历过的严峻挑战。人类从未有像今天这样强大，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脆弱，也因此从未像今天这样彼此连接、相互依存。跨文化交际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全球人共系同一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或者选择和谐相处，或者选择一起消亡。我们深信，社群感是人类文明的先决条件（杜维明 2018），“唯有共同体才能拯救世界”（Peck 1988）。天下人唯有通过平等的跨文化交际和对话实现和谐相处、共生共存、共同发展，探寻共同的人性，求索共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确保人类生存，才能促进人类繁荣，才能维护人类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

全球化就是跨文化，跨文化交际和对话已是人类——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不论是在个体还是社群或国家之间日常交往的现实，学习如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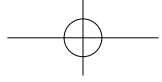
际、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为日常交往能否成功的前提。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尤其其理想形式跨文化对话已成为人类预防和解决对立和冲突、消除跨越文化藩篱、超越差异和对立、建立和谐关系（Jia 2017: 29-37）、把碎片化世界连接成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使人类与自然产生同情共鸣的不可或缺的机制，跨文化交际和对话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和保障。

21世纪，人类面对方方面面的挑战——文化、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政治、意识形态、精神、道德、伦理、宗教、科学和技术等等，不胜枚举，然而，全球化的挑战，本质上，是对全球社会不同种类和不同层次的教育，尤其是对跨文化交际以及以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的外语教育的挑战（Jia 2015: 179-206）。跨文化交际教育从未像今天这样担负着拯救人类命运的历史责任；从未像今天这样肩负着人类的未来；从未像今天这样担当着培育人们“学会在一起生活”（UNESCO Delors Report 1996）和学习成为对人类星球负有责任的全球公民的历史使命（Jia 2015: 179-206）。把这一交际文化观引申到跨文化和跨国家或全球层面，尽管全球文化与交际的关系更加多维和更加复杂，我们仍可推断，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时代之必需，也是跨文化交际过程本身所固有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其最高的目标。

传统的跨文化交际教学，以及以跨文化为目标的外语教学片面强调教学的实用性或工具性，突出语言和交际的实用或工具价值，忽视其自身所担负的为共同体和全球公民做准备的教育价值。21世纪的跨文化交际教育，以及以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的外语教育担负着实用和育人载道的双层目标，跨文化交际教育应充分实现并发挥其实用/工具和教育的双层价值。应能使学习者通过跨文化教育不仅能在多元文化的全球社会中游刃有余、与不同文化的人们进行有效交往；而且能够跨越文化的藩篱，超越差异和对立，与天下人共同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跨文化教育最完整的诠释，是跨文化教育的最高价值和全部意义所在（Jia & Jia 2016: 179-206, 2017: 29-37）。Coulby（2006）指出，“人类历史越来越是全球跨文化教育和灾难相互竞争的历史，……不选择跨文化，教育必然会沦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原教旨主义的温床。”曾经是遥不可及的为命运共同体和其公民做准备的跨文化教育，在21世纪，不仅必须、可行，而且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其公民做准备的跨文化教育应成为21世纪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中心任务和重要标志。

## 2. 跨文化研究的宏大视野

人类的文明史是不同文化共同创建的历史。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和



中东与北非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以色列和散在各地的犹太文化,或简称东西文化(汤一介 2007: 175)。世界历史有四大文明:希伯来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有关)、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这些文化和文明都是世界进步和发展的有价值的资源。在21世纪全球文化进行重新整合的今天,它们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本源和原动力,各自文化也通过交流和对话“互为主体”、“互相参照”、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文化(汤一介 2007: 2),从而得到更新和进步。世界文明在这样多元文化的进程中得到发展。

在现代化向全球化转变的21世纪,我们必须跨越文化、跨越国界、跨越时代、跨越东西方界限、跨越语言,也要跨越学科边界。“我们必须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来观察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样才能看出东西文化体系相对消长、互相学习的关系”(汤一介 2007: 3)。只有放眼观宇宙,以全部人类历史和整个地球和宇宙为背景,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西方文化,了解东方文化,了解中国文化。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给西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给东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确定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准确地给全球文化以应有的地位。

多年来,国际上流行的是西方文化体系,西方启蒙精神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是我们共享启蒙精神之宝贵遗产。但启蒙心态固有的缺失所产生的破坏力也使人类深受其害。基于人类中心宇宙论的启蒙精神之唯理——本质主义导致的“身心二分”,“非此即彼”的主客二元对立,以及以自我为中心、以自身利益作为度量一切标准的现代主义,破坏了天人之际和人际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给人类、自然以及启蒙精神本身都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在个体及文化层面的交往中,唯理——本质主义的一切以个人的权利、尊严和利益为中心的“利己”或“一切为己”的交际伦理把他者客体化,把他者边缘化,使他者成为说服、排斥、改变、控制、支配和征服的对象。作为相互理解、容忍、认可、欣赏、尊重并庆祝差异的对话这一解决冲突和维护和平的修辞,被本质主义者视为“一种说服和改变他者的开场白”(杜维明 2006: 151)。西方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本质主义忽视或无视他者,不顾我者与他者关系的存在的必要性,无视多元文化存在的必要性,所追求的是虚构、同质的整齐划一,而不是多元文化并存、“和而不同”的共同体。只突出狭隘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社会达尔文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及实用主义——的西方文化,不仅难以担当重新整合全球社会的重任,反而会带来巨大的副作用,给人类、自然乃至启蒙精神本身带来巨大破坏。

21世纪从现代化到全球化的转变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需要一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精神人文思想和全球伦理,这意味着对人类

中心宇宙论的超越，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维持和平文化、和谐全球社会关系和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放眼观宇宙，以人类全部历史和整个地球为视界的“人类宇宙”世界观和人生观。从“人类宇宙”世界观出发，通过跨文化交际和对话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公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 3. 跨文化教育的新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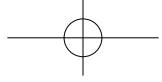
21世纪的跨文化交际教育应是一个以重新获得生命力、海纳百川的“天地与我并生，与万物为一”“万物皆备于我”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一体之仁”的人类宇宙论为视角，以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公民教育为目标，以“利他”和“利己利人”之全球交际/对话伦理所导引的跨文化交际、尤其是其理想形式平等对话为路径的育人载道的教育。21世纪的跨文化教育应实现从以培养实用性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向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公民教育的转变。为此，跨文化教育必须在目标、视角、路径以及研究范式等方面实现历史性的超越。关于目标或使命，在上一节已经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 3.1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宇宙论

我们主张，教育应以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公民教育为目标，实现对传统的以实用/工具性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的教育的超越。在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应以儒家“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宇宙论为视角，实现对传统的启蒙心态下的“人类中心主义”宇宙论为视角的超越。

人类宇宙论把学以成人看作实现己、群、地/自然和天四个向度融为一体(杜维明 2018)的过程，这是一个永不间断、以自我为本源、创造源泉和原动力的自我为中心，向他者伸延、扩展并与其交融和认同、与不同文化和共同体互动和认同的过程。这是一个从自我逐步向家庭、社会、国家以及超越国家的世界，以及超越世界的宇宙等认同或同情共鸣的社会化过程。自我与家庭的社会化是众多社会化的核心和基础，与国家共同体之认同并取得国家公民身份的社会化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完成，超越国家与全球文化认同并取得全球公民身份的继续社会化主要通过学校全球化教育，或被称为全球跨文化交际教育完成。与宇宙认同或与其产生“同情共鸣”、创建“人类宇宙”共同体，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得“人类宇宙”之身份，是取得人类最高理想的身份，这是21世纪全球化时代我们对“仁”或“仁者人也”的诠释或定位。这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公民”之培育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完成。这是使自我逐步学以成为家人、社会/文化人、国民以及跨文





化人、全球人、全球公民、生态人及宇宙人的永无止境的学以成人之道。

国家公民主要以领土为界的国家身份为基础，而全球公民则在精神上跨越文化、国家乃至时代的边界，主要以人的人格和品质为基础。全球公民、“人类宇宙”之身份是对国家公民身份人格和品质的丰富和升华，是对其的伸延和扩展，是更加完整的人性。全球公民身份不是对国民身份的取代，不构成对国民身份的威胁。做人的质量之程度取决于个人向他者和天下万物伸延和交融的深度和广度。

任何人都不是一座与世绝缘的孤岛，在时空紧缩的21世纪尤为如此。全球化时代的每个人，有意无意和自觉不自觉都被卷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全球人——文化、社会、经济、政治、语言、生态、教育等等。逆潮流而动显然是逆人性的行为，“学以成全球公民”和“学以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学以成人”的过程，这是全球化时代对每个人的最基本也是最高要求，是本体论上的最基本信念。

### 3.2 导引和确保平等对话的伦理

我们特别指出，“我者向他者延伸和交融”的过程是一个不同个体、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文明之间符号互动与交融的过程，是用语言进行交际或跨文化交流和交融的过程。这是一个开放、包容、海纳百川，以人类共同人性、多元和多边主义和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全球伦理所导引的平等对话的过程。我们认为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公民的核心价值伦理孕育在全球伦理所确保和导引的平等对话和协商之中。“即使冲突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对话也是必要和可欲的”（杜维明 2006：152）。

为实现平等对话，我们实现对启蒙心态下理性—本质主义或现代主义所倡导的“身心二分”、“主客二元对立”的“利己”或人权伦理所导引的“独白—说服”式交际路径的超越。

这一文化交际观是对跨文化交际概念的全新诠释，是对其最完整的诠释。关于交际对话全球伦理的求索，超越理性之身心和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利己”的“人权”伦理的儒家的恕道和“利己利人，达己达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仁/人道，是全球伦理建构的文化资源，不乏是一个明智的出发点。

### 3.3 求索共同，创建共识

为确保以上几个超越的实现，我们必须实现对传统的研究范式的超越，即实现对传统的偏重文化间差异、忽视文化间共同之处的研究范式的超越。开放和具有无限包容和交融力的“一体之仁”宇宙论本身不仅预设着不同个体、不同文化和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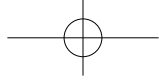
文明之间的互动和交融，在研究领域还预设着多学科、多途径和多视角之间的互动和交融。本文把传统的注重跨文化交际差异和对比的社会心理、被称为客位(etic)研究范式和注重“环境中的交际”的主观寻绎推演、被称为主位(emic)研究范式，以及以批判性自我反思为核心的“批判/思辨”研究范式有机融合。客位研究范式注重文化差异和对立，是本质主义所主张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多年实践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但过分强调差异和对立而忽视文化间的共同之处，会有意无意地使差异刻板化和极端化，从而扩大交际双方的分歧和对立，构筑文化藩篱。主位研究范式着眼共同之处、强调创建共识、注重交往中的协商和对话，重视交际双方的对语码的共同编译，有利于和谐关系。

同一星球上的人们共同之处远远大于差异，只强调彼此之间的差异，尽管有利于彼此借鉴、相互学习，但会扩大分歧和对立，会导致沟通距离，会使全球村民犹如“咫尺若天涯”。如果彼此在交往中能洞察相同之处并共建共识、探寻契合、相互认同，会使天下人“天涯若比邻”。孔子说的“性相近，习相远”道出了人际间的“共同”与“差异”，“近”与“远”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性近”为本、为根，“习远”为标、为末，二者辩证统一，其互动使“和而不同”的命运共同体之实现成为可能。

我们还应扩展后现代主义者倡导的批判/思辨性范式，把儒家的“利他”及“利己利人”的全球伦理作为批判和思辨标准，引导学习者在参与全球社会生活过程中进行批判性自我反思、开展批判性行动，从而达到创造性的改变和重建自我、重新认识和改变世界，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成为具有社会责任心的全球公民。以人类的全部历史和整个宇宙为视野的“人类宇宙”观，能使我们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不仅在人类的立场加以定位，而且在“人类宇宙”的立场上加以定位(杜维明 2006: 190)。能使我们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将全球公民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意义，在“人类宇宙”的立场加以定位。

“人类宇宙”观能使身心、精神与物质、人与自然、做人和做事、内心和知识、情与理、个人和群体以及责任和权利等通过平等对话交融为一。天人合一的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东方文化和以理性主体性、身心二分、主客二分的外在超越为特征的西方文化通过平等对话高度交融。唯有在“人类宇宙”精神导引下，自我与他者才能和平相处、己文化与其他共同体才能平等交流和沟通，人类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人类与天道之间才能互惠共赢。

“人类宇宙”精神预设“学习成人”的过程，旨在促使人类自我通过跨文化交际和对话超越“小我”、成就“大我”之我，逐步发展为跨文化人、全球人、宇宙人，这是“学以成人”过程的最完整的体现。这是对“人之所以为人”，公民之所



以为公民，共同体之所以为共同体的意义最完整的诠释，是21世纪全球化时代之育人载道的跨文化交际教育的历史使命的最完整的定位。

### 参考文献：

- Coulby, D. 2006.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Trend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17 (3).
- Hall, E.T. 1990. *The Silent Language* [M]. New York: Anchor Books.
- Jia, Y. 2015. The anthropocosmic perspective 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or global citizenship: Learning to be global citizens as learning to be human [A]. In Sun, Y. (ed.). *New Perspectives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 [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79-206.
- Jia, Y. 2017.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ime and space, intercultur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A dialogic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Dialogue, ethics, and culture [A]. In Dai, X. D. and Chen, G. M. (ed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 London: Routledge, 29-37.
- Jia, Y. and Xuelai Jia. 2016. The anthropocosmic perspective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earning to be global citizens is learning to be human [J].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1): 32-52.
- McLuhan, H.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M].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 Peck, M. S. 1988. *The Different Drum: Community making and peace*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UNESCO (The Delors Report). 1996. *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 Paris: UNESCO*, pp. 61-63.
- 杜维明, 2018, 为什么“学做人”, 《光明日报》, 8月11日11版。
- 杜维明, (彭国彰编译), 2006, 《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 汤一介, 2007, 《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贾玉新，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通讯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92号，邮政编码：150001。电子邮箱：yuxinjia1228@163.com。